

# 西方历史哲学综论

张文杰

最早使用“历史哲学”一词的是法国哲学家伏尔泰,1765年出版了他的《历史哲学》一书。在伏尔泰看来,“历史哲学”就是寻求在其整体上理解历史、理解支配历史的那些原则及它可能隐含着的意义。伏尔泰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堆积历史事实,它应该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论的理解高度。

思辨的历史哲学可以说自古有之,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是随着分析哲学的产生而出现的。1951年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出版,从而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之外出现了“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个新学科。“历史哲学”一词的含意,在西方,随着时代的不同,科学观念和哲学观念的改变,也是不断改变的。过去的历史哲学只注重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的研究,着眼的是历史的客体,而自从分析的历史哲学正式登上舞台以来,历史哲学家们的重点就逐步转到历史思维与历史知识性质的问题上来,也就是说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的客体的问题上来。

严格说来,希腊人没有创造出一种历史哲学,尽管他们有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和普鲁塔克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以及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家家。从中世纪到近代初期,占统治地位的应该说是神学的历史观。人类的历史被看成是一幕天意的体现。由于西哥特人夺取罗马刺激了圣奥古斯丁的哲学心灵,使得奥古斯丁对世俗文明进行了沉思,他寻求用超自然的天命来拯救人类。而这沉思的结果就是关于历史哲学的第一部伟大的著作——《上帝之城》。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尘世之城的历史。

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历史是一出世人赎罪的戏剧。圣奥古斯丁表明,人类的历史整体可以为一种单一的观念所解释和理解。我们的一切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基本上是一系列解释人类历史的整体的企图)皆来源于这种确信。奥古斯丁解答一切历史问题的论据,不是来自经验的研究,而是来自天启。奥古斯丁的这些思想反映了罗马帝国崩溃时期整个社会思想的状况,它对以后的宗教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经院哲学打下了理论的基础。

18世纪历史哲学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自然规律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逐步占了上风。人们注重自然科学,而此时哲学把人类的心灵和它周围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主题。哲学家们从“人”的方面,而不是从“神”的方面去看历史。历史学家们也不再把“上帝”作为历史的中心,而是以人类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维科力图把历史改造成一门“新科学”,他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他要在神意之外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维科于1725年出版了他的伟大著作《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则,从中得出关于各民族自然法的一些新原则》,简称为《新科学》。这本书构成了历史哲学世俗化的开端,它涉及到各个民族共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是维科第一个在理论上划分了上古、中古和近代的区别。与基督教思想家们相反,意大利思想家们真正关心的是对历史的自然法则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人类本身的自然过程的研究,而这与超自然的干涉无关。维科的伟大发现是“社会的世界必定是由人创造的;所以,它的原则能够而且一定在我们人类的心灵本身的变更中找到。(见维科《新科学》136页)维科虽然信仰天主教,但是在维科那里上帝在历史中的作用只有通过他所创造的人性间接地起作用,而不再进行直接地干预。

伏尔泰第一个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个术语。1765年他以《历史哲学》的标题出版了他的著作。他认为全部的历史的解释都服从于一种定向的价值、一种理想的手段。在伏尔泰看来,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值得写,只有那种能够描写人们的天资和习惯的东西,那些能够充当教训和劝告人们爱美德、爱艺术和爱祖国的东西才值得写。因此伏尔泰是写文明的历史而不是写国王的历史,这在写历史和解释历史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他打破了希伯莱—基督教的伦理垄断,坚持异教徒在文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伏尔泰试图把历史的和自然的一切事件当作普遍规律的必然产物来解释。虽然有时他也借助于上帝,然而在伏尔泰那里,上帝失掉了它的神学的特点,而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由于伏尔泰,历史哲学从神学阶段进入了形而上学的阶段。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实证主义哲学逐渐占了上峰。实证哲学否定神学,认为各种思辨哲学都是形而上学。实证主义认为,人类认识的各个领域都是逐渐地从超自然的神学阶段开始,经过思辨的形而上学阶段,而达到以经验为根据的、“实证的”、或科学的阶段。

实证主义者以纯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学。他们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其中得出结论。在他们看来,在原则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并无不同,一切科学的基本性质都是统一的、一致的,因而他们力图以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来总结历史,建立起一种社会发展的科学。他们相信历史是被它那内在的、必然的、普遍而客观的规律所决定,正如自然界是被自然律所决定的一样。这种信念到了二十世纪受到分析派的猛烈攻击,然而它的历史影响却始终是不可低估的。

19世纪在德国可以说是历史哲学群花竞相开放的时代,康德、赫德尔、黑格尔等哲学家,还有历史学领域里的兰克学派等等。德国唯心主义者把文化科学和历史领域同自然科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康德、黑格尔等唯心派哲学家把历史看作是人与社会制度不断顺应理性观念的过程。

在康德看来,人类的行为同自然事件一样是由普遍规律决定的。历史就是叙述这一表现的。康德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发展进化的过程。他提出:“人类历史整个说来,可以视为一幕在自然的隐蔽的计划的实现”。因此人类的历史就同时具有合目的性(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和合规律性(按照一定的计划而展开)的两重性。随着人类之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政治状态,人性也就逐步地得到其完美的实现。这一实现过程就是历史。康德深信人性完美终究会

在历史中充分实现的，但是这种实现不可能是在每个人身上，而只有在人类的集体之中，在全部的历史过程之中。而人性中的恶或自私之表现于每个人的身上，就恰好成就了人类整体的美好。康德把历史视为一个理性观念的发展过程。

赫德尔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一书继承了启蒙运动的进步思想，他把历史看作是进步的，但是他否定了把历史看成是直线发展的观点。他提出人类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实现人道，因此历史乃是一个有意义的而又合理的过程。但是他与同时代的一般看法不同，他并不把人性看作是一个常数，因而他并不把历史看作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思想意识的表现或反映。他宣称具体的人乃是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不同条件之下的历史产物。赫德尔还力图将民族性与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信念结合起来。这一论点是对十八世纪把人视为永恒不变这一基本观点的一大突破，与这一理论紧密相联系，赫德尔提出，应该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民族精神来考察各种历史文化的特性，应该把历史视为是外因（环境）和内因（精神，尤其是不同的民族精神）相互作用的产物。赫德尔承认在不同的人种之间存在着差别。他认为中国的文明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文明不是因为中国的地理和气候，而是由于中国人的特性。如果不同的人种被置于同样的环境中，他们就会以不同的方法开发那个环境的资源，从而就创造出不同的文明来。

在黑格尔那里，上帝是抽象的，是绝对的或逻辑的观念，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力量，而不是超自然的行动者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意思，绝对精神在哲学中、而不是在宗教中达到自我意识的最高程度。对他来说，唯一的哲学是绝对理念的“适当的”表现。黑格尔与以往的启蒙思想家轻视历史的态度不同，他重视过去、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本身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它就是理性自身（精神或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黑格尔力图通过对历史内在辩证法的考察而揭示出其中所隐藏着的意义。黑格尔把历史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原始的历史。这种历史大部分是历史学家所亲身经历过或亲眼所见，这种历史的特点就是“无反省”；第二种是反省的历史。在这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抽象的观念，用思想来概括一切；第三种是哲学的历史。黑格尔认为“历史哲学”不过是“历史的思想考察”罢了。

对黑格尔来说，历史哲学并不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的反思，而是把历史本身上升为一种更高的势力并使之成为哲学的而有别于单纯经验的，也就是说，历史不仅仅是作为如此这样的事实而加以肯定，并且还由于领会那些事实何以是那样地发生的原因而加以了解。这种哲学性的历史将是一部人类的普遍的历史，而且将显示出从原始时代直到今天的文明的进步。（见《历史的观念》，第129页）。黑格尔坚持自然和历史是不同的东西，因此他拒绝通过自然来研究历史。他区别了自然的非历史过程和人类生活的历史过程，这是正确的；但是用否定进化的学说来强调这种区别，就是错误的了。柯林武德在评价黑格尔时，曾说过，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不仅要知道人们都做了些什么，而是要了解他们都想了些什么。

历史是精神的自我实现，是自由的扩大或自由之体现于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之中。黑格尔这个基本观点对后世历史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斯宾格勒称自己的历史哲学为“文化形态史学”。他提出一套与众不同的看法，传统的方法把世界历史分为上古、中古的近代，这是欧洲人的骄傲与近视的产物。他则以各个文化各个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代替之。在他看来，历史是由许多文明组成的，每一个文明大体上都经过起源、生长、衰落和灭亡的周期过程。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实证主义者和德国唯心主义者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两派都认为欧洲文明是代表人类历史顶点，而斯宾格勒则认为西方文明只是许多同样文明中的一个而已，而且这个文明还在走向没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于世界的命运如何，人们正在左右彷徨之时，斯宾格勒的观点无疑在西方世界会引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震撼，西方的文明到底没落没有，还有没有希望？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斯宾格勒以暗淡的笔调预言了所谓西方的文化行将没落。

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是到神学阶段的复归。在汤因比看来，上帝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是最高的历史事实，宗教是唯一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题材。历史转变成为神学确实是理解全部汤因比历史哲学的钥匙。本世纪中叶，汤因比的十二卷巨著《历史研究》先后问世。汤因比在他的《我的历史观》一文中是这样说明他的主要论点的：一、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理解的基本单位是“文明”，或者称为“社会”，而不是一般人所称的“民族”或“国家”；二、人类历史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平行的”和“同时代的”。汤因比为人类历史描绘了一幅总的图式：

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可分为二十一个文明，或者说二十六个文明（其中包括五个发展停滞的文明；每个文明都经历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文明起源和生长的原因是：挑战和应战，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富有创造性的个人或少数人发挥创造性，没有创造性的多数人则只有“模仿”少数人... ..文明衰退的原因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因此不再是创造性的少数，而退化成为统治的少数，多数人不再模仿，于是就产生了“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不能继续统治，就采取了镇压的手段，多数人起来反抗，于是文明的没落时期就到来了；文明衰落的标志是“统一国家”的诞生，无产者则创办教会对抗之。

上面所论述的是各个不同时期的哲学大体上都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试图在一大堆貌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的背后，寻找出理性的原则、规律或意义来。本世纪初，由于自然科学上各种新发现和新理论的百花怒放，旧的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就悄然让位于所谓的科学的（或分析的）哲学，于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就随之而日益让位于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趋势，这一重点的转移，在自然科学的哲学上和在历史哲学上是紧密相关的。

分析派哲学家们的出发点是：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哲学的任务应该是、而且主要就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这样，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就把研究的重点从解释历史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分析派所面对的问题就更多地是历史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更多地是人们是怎样在认识历史的运动的，而不再是历史自身是怎样运动的。对于分析的历史哲学来说，更重要得多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和解释，而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

英国唯心派哲学家布莱德雷的著作《批判历史学的前题假设》一书于1874年出版，通常认为这是现代分析历

史哲学的开端。他认为历史必须有批评的方法。历史的事迹，大都不是作者自己所能作证的事件，常由以往述说事实的人作证。这些作证的人是否可靠，应该由作者来予以评判。作者接受作证人的作证，就是作者本人在自己的心灵中重建作证者的思想。也就是说，历史知识不是盲目地、消极地接受证词，而是要对证词作出一种批判的解释。

狄尔泰于1883年在他的《精神科学序论》中区别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狄尔泰看来，历史所论述的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而自然科学论述的则是抽象的、一般的事物。从来历史哲学研究历史之因素、其发展之法则与价值之标准，此所谓“实质的历史哲学”。但要决定实质问题，还要追究其根据，此即历史知识有无可能，界限如何，方法之原理如何，此所谓“形式的历史哲学”。狄尔泰高唱“历史意识”，企图树立史学独立的方法逻辑，拒绝科学与哲学对历史之干涉，以求得人类之自由。他并不研究历史发展之规则，而注意历史知识本身种种问题。

德国的历史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可是人们是在二十世纪通过特勒耳奇的著作才了解它的。1922年特勒耳奇为“历史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即我们对于精神世界的全部知识与经验的历史化。历史主义把每个人、每个事件、每个国家、或每个时代当作独特的个体。而每个个体都有区别于其他的个体的特征，但也应考虑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与文化科学，在方法上同自然科学截然不同，前者试图对独特的现象进行直观的理解，而后者则寻求对行为的一致性进行解释性的概括。历史学家必须直觉地静观历史的现实，以便重新体验过去的时代。科学主义主张人类与历史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主义只是主张社会与历史范围有其独立性，只能用历史方法。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历史学家梅尼克等人都严格地区分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强调其不同，就在于历史学是对只出现一次的独一无二的现象的理解，因而人们也就不可能总结其普遍的规律。他们都强调直觉在历史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并把历史理解说成是主观的东西。

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克罗齐和柯林武德都在致力于论证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他们认为历史科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提供的是有关个体的知识，而不是一般的或普遍的知识。自然科学之研究自然界是从自然界的外部来加以考虑的，而历史科学之研究人类的经验和思想则必须从人的内部加以考虑。两者不仅方法不同，而且其所要证实的假说，性质也根本不同。人类历史乃是精神的历程；人类的每一桩活动都渗透着人们的思想，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是，历史学必须对于这些过去的思想进行再思想（或反思），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历史。由此推论，过去的历史之所以为人们所理解，是因为历史学家们使其为人们所理解。他们主张实际上是把如何可能理解历史放在历史哲学的中心地位。因此，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主观认识。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事实，而仅仅是具有思想的行为。

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是思想的产物，是对过去时代的活思想，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它只存在于历史学家对它的思想认识之中。克罗齐强调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历史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不承认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就不可能理解历史思想的实际变化过程。克罗齐认为历史就存在于我们心中。

柯林武德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就是思想史，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演过去的思想，但那并不是简单的重演，而是把过去的思想囊括在现在的历史学家的活思想之中。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是一门自律的科学，它不受自然科学的支配。柯林武德还猛烈地攻击了剪刀加浆糊的传统史学。这些论点对后来的历史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克罗齐与柯林武德在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都强调哲学与历史学的统一，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哲学家，同时又都是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哲学内容丰富，不像有的分析派哲学家在论述历史学的理论时显得空洞无物，只有一般的抽象的逻辑分析。柯林武德自称他一生都致力于在哲学和历史学之间搭起一座友好的桥梁的工作。哲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是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

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家们肯定了人类历史的锁链中，人类主观的意图和努力乃是其中最本质的一环，所以不少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家就由此径直走向了根本就不承认历史有客观规律的地步，从而也就不承认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是可以预见的。

波普尔在他的《科学研究的逻辑》一书中谴责了一切思辨的历史理论，说他们只能是伪科学；在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又论证说，人类知识的进步是不可能预言的，而历史的行程又在极大程度上受到知识进步的左右，故而历史行程就是不可能预言的，也就是说，历史进程并无客观规律可寻，——即历史是不能预见的，未来是不能预知的。波普尔研究历史解说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国家分析派的特色。而大陆的当代历史哲学家们则带有较浓厚的生命哲学的传统色彩；然而，双方的结论却往往有殊途同归的地方。阿隆的历史哲学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梅洛·庞蒂则强调历史的主观性，认为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主观的产物，并不具有客观性，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历史的客观规律性。维特根斯坦、文茨等分析派哲学家以为人类行为之有无意义并不取决于研究者，而是取决于行为者对意义的理解。

在罗素看来，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科学就其一般的意义上讲，它只是指弄清事实。历史著作如果要产生社会效果，它就必须有趣味性，使人们能像读诗歌或者看好的小说那样对历史产生兴趣。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他所描写的人物要有感情。当然，罗素也谈到这是以历史学家不应该歪曲历史事实为前提的。罗素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在罗素的观点中特别强调治史“贵有史识”，那些人云亦云、自己不去探索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写史贵有创见，能道人所不能道。在罗素看来，历史人物的作用与“机缘”有着紧密的关系。所谓“机缘”就是“各种具有重大影响的细小事变”。在两大势力处于大致平衡的时候，一小点力量就会“翻倒整个天”。因此偶然事件也会在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

亨普尔认为，“解释任何事件（不管什么性质）只需把它纳入一条普遍规律之下，根据它，如果已知某些能详细说明的条件发生，原则上就可能预告所谈论的事件”（转引自《历史思想导论》201页）。在亨普尔看来，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与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是十分类似的。它是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丹托以为人们对同

一件历史事实的理解，既可以是思辨的，又可以是分析的，两者并行不悖，并且可以同等地是真的。

总的说来，分析派的办法是从历史规律转而研究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可能性，把它隶属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之下而重新考察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前提和假设。这个工作如果做得正确，当然不失为一项具有科学价值的工作。但是他们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却摆脱不了自己狭隘的哲学观点的束缚。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分析学派在西方（尤其是在英、美）哲学界几乎占有压倒的优势，从而影响及于西方历史哲学也日益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历史学命题的语言意义分析方面来；尽管也不乏有某些人（例如汤因比就是其中一个）仍然在努力构造其思辨体系，但普遍的趋势却是更着重于对历史理论的知识论研究。对于不同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我们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尤其是对一些古典的、体大思精的思辨历史哲学体系；对其中所饱含着的时代合理性以及其中许多洞见的深刻性，决不是简单地以“不科学”的名义所能一笔抹杀的。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往一些有价值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虽则并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历史的真实和全貌，但它们是有所贡献的。反之，对分析派有关历史哲学的许多论点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承认，当代的分析学派在语言意义和逻辑概念的分析技术上，确有其细致深入的一面。这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在历史哲学问题上，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澄清和认识的深化。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这些方面以及在许多别的方面确实做出了不少贡献，对于某些问题的提法的精确度和明晰性都超过了十九世纪以前的思辨历史哲学。然而，对语言意义和逻辑概念的分析虽则有助于，但终究不是，也不能代替人类对客观世界（包括历史在内）的知识本身。正如同分析哲学的分析研究，不管做出了多少进步，并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哲学问题一样，分析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历史哲学本身固有的问题。

原载《江海学刊》1999年第一期